

鲁迅《二心集》中的国民性思想探讨

■ 董 影

内容摘要:对国民性的探究和思考是鲁迅一生的坚持,是鲁迅创作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创作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下,日益紧张的压迫和强烈的战斗意识使其国民性思想表现得更加深刻。《二心集》延续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将改造国民性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以对未来文明的试想完成对国民性思想的建构。《二心集》从社会现象入手来揭露国民劣根性,通过查找国民精神衰弱的源头来表达国民性思想,为改造国民性提出了解决方案。

关键词:鲁迅 国民性思想 《二心集》

鲁迅从黑暗的封建社会中走出来,饱受世态炎凉,体会人性的冷漠与悲哀,不断地对历史进行清算。在动荡的社会时局中作斗争,经历世事变迁,遭受各方的攻击与压迫,不断地对现实进行批露。于新旧文明的冲突中做对比,反思古老文明,接受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不断地对未来进行设想。可以说鲁迅的国民性思想是与历史、现实、未来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国民性进行探索与思考。杂文的创作是鲁迅对时代环境的深刻体会,国民性思想的表达在杂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鲁迅的杂文集《二心集》创作于思想转变与社会斗争的关键时期,是鲁迅1930-1931年杂文创作的结集,通过分析其中的国民性思想,可以挖掘鲁迅杂文中国民性思想的内涵与具体表达方式,体会鲁迅杂文对改造国民性的重要贡献,从而激励当代社会以鲁迅的精神为引导,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一. 鲁迅国民性思想的缘起和发展

鲁迅经历了新旧交替的时代,少时的家道中落使鲁迅与时

代的接触更为紧密。在经历了“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后,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2]。从绍兴到南京求学,这时中国正经历改良主义运动的失败,鲁迅在求学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中国的落后,新环境中的“中国人”也并非鲁迅心中的“别样的人们”。在南京求学的过程中,他阅读了严复的《天演论》,在爱国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进化论,这也成为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重要武器。在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泥沼里,鲁迅要做的是求变的时代新人,于是去日本求学,日本的改造国民性运动深深地影响了鲁迅,在弘文学院的学习中鲁迅多次思考国民性问题,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提到与鲁迅常常讨论的三个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3]这个时期,国民的病根问题已成为鲁迅的重点关注对象。促使鲁迅弃医从文的转折是其在仙台医专看到了关于日俄战争的影片,影片中有麻木的中国人,影片外则是冷漠的看客,鲁迅开始意识到改变国民的精神才是第一要务。在时代变化的巨大洪流中,

鲁迅体会到封建社会人心的冷漠与愚昧;在求知的路上,鲁迅吸收了更多的思想,以强烈的爱国情怀体察中国国民的精神缺陷;在文学实践的过程中,鲁迅一直坚持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针砭。

鲁迅关于国民性思想的文学实践早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中就有所体现,鲁迅从爱国热情出发,试图激起国人的战斗精神。“立人”是鲁迅早期革命思想中的重要组成,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提到:“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4]鲁迅批判了中国人的自尊自大、抱残守缺等劣根性,将改变中国沉沦落后局面与改造国民性紧密联系起来。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发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5]的呼声,呼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鲁迅早期的文章深入历史与科学,宏大的视野中已对国民性有了初步的关注和重视,这为鲁迅后期国民性的书写奠定了基础。

鲁迅回国后的社会环境也并非平静,革命的失败使鲁迅意识到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他提道:“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

全不行的……”^[6]对国民性的关注逐渐成为鲁迅的重要精神构成。对国民性的批判在鲁迅加入新文化运动后更加显现出来,在文字上对国民性思想的构筑更加清晰。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揭露在所谓“圣人之徒”影响下的中国人的凋敝萎缩,对中国人发出这样的呼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7]在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中,鲁迅呼唤着中国人的觉醒,对于国民性的挖掘在其小说实践中不断深入,在《呐喊》中鲁迅通过挖掘国民性来进行战斗,其中对于国民性的探讨在《阿Q正传》中达到了高峰,阿Q的精神胜利法包含了中国国民的诸多劣根性。在对诸多形象的塑造中鲁迅的国民性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在之后的《彷徨》中继续对国民劣根性进行揭露与针砭,表达他对中国国民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应该说,鲁迅小说书写了国民非成长的命运变迁及病态的时间观念,由此也呈现了一个‘停滞中国’的形象”^[8],老中国儿女们在历史的恶性循环中坐稳了奴隶,鲁迅用经验和经历书写了这样的国民思想现状。在小说的书写中鲁迅将国民性的整体批判转向个人、家族和社会生活中,更清晰地展现国民劣根性。鲁迅在其小说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国民性思想,在战斗的过程中逐渐完成对改造国民性的建构。

鲁迅的一生都在求索,对于国民性的探究也不曾停歇,在经历了时事的不断变迁后,鲁迅的战斗力量犹在,小说之后,鲁迅又迎来杂文的创作高潮。在短小、战斗意味强烈的杂文中,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也无处遁形,“刽子手主义和僵尸主义的黑暗,小私有者的庸俗,自欺,自私,愚笨,流

浪赖皮的冒充虚无主义,无耻,卑劣,虚伪的戏子们的把戏,不能够逃过他的锐利的眼光”^[9]。在前期的杂文写作中鲁迅与封建主义作斗争,其中不乏对文坛现状和当局的讽刺,也有对青年们的建议,在这些议论中,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成为论证的重要支撑。同时鲁迅杂文作为进行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工具,不断地解剖国民性,尖刻而犀利的批判国民劣根性。在战斗的过程中,鲁迅关注的不是个人、不是群体,而是整个中国社会,致力于用国民性思想去改造中国社会。

鲁迅用杂感不断地抒发改造国民性的热情,“据不完全统计,在鲁迅后期杂文集从《而已集》到《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就有40余篇杂文论述了中国国民性问题”^[10],鲁迅在后期创作中是代表无产阶级战斗的,对国民性批判在其杂文中也逐渐加深。《二心集》创作在鲁迅加入左联的时期,这时候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加强,但鲁迅仍在艰难环境中揭露他所看到的国民劣根性,在此后诸多杂文的写作中于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挖掘劣根性,在国民劣根性沉积的现状下寻找解决方案。可以看到,在鲁迅从一个写作高潮转到另一个写作高潮的过程中,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直贯穿始终。

二、《二心集》中鲁迅的国民性思想

在写作《二心集》之前,鲁迅已经经历了思想上的变化,逐渐由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尽管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始终是鲁迅进行战斗的一个前提。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官僚主义、复古政策等无一不影响着中国国民的生活,国民劣根性在黑暗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地暴露出来,改造国民性的任务日益紧迫,可以说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也促使鲁迅转

向了无产阶级阵营。左联是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争取战斗阵地的组织,鲁迅在加入左联后有了明确的战斗任务,在其杂文书写方向上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二心集》中的杂文写于左联刚刚成立的时期,其中的战斗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同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在《二心集》中鲁迅开始用多种笔名写作,可以看到社会局势的紧张、国民党当局对左联的压迫。鲁迅在阶级斗争激烈的环境下,仍然坚持揭露国民性,在杂感中用国民性思想来宣传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通过对国民性的批判来进行阶级斗争,国民性思想更加丰富。

首先,在《二心集》中延续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与批判。中国人的自私、虚伪、保守、奴性、自欺欺人、善于做戏等劣根性在鲁迅的笔下展现的淋漓尽致。自社会环境动荡以来,中国一直面临如何改革的问题,在《习惯与改革》中鲁迅深刻批判了阻碍国家进步的国民性:“体质和精神都已僵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的极其公正而且堂皇”^[11],短短几句剖析了国民的僵化、自私、虚伪,讽刺意味强烈。在对“一些人”的批判中,鲁迅挖掘出存在于他们背后的国民劣根性,例如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中鲁迅讽刺了颓废者和毫无立场之人,他们正是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这种个人主义的论客实际上正是代表了善于自我满足、安于现状、折中的一类人;《以脚报国》中对杨绉华的批判中,讽刺了中国人的自欺欺人,进一步揭露了不愿正视现实而善于粉饰太平的一批人;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中鲁迅批判“青年援马团”,在论述中结合中国人“中

庸”的老例来说明中国式的“堂·吉珂德”，对那些善于做戏之人进行了批判。中国人身上一直存有奴性思想，这也是鲁迅一直以来深恶痛绝的，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中提到劳苦大众受到压迫之后，只能默默地等待灭亡，借劳苦大众历来的奴性说明黑暗的现况，以更好地宣传为劳苦大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进一步揭露了中国人的奴性：“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镬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14]，而奴才始终只是奴才，不能与主人“同存共荣”，中国的奴才一直都是“永含着恋主的哀愁”^[15]。中国人的奴性也体现在对洋人上的谄媚上，“但所说明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咱们蒙古王孙即使国内如何战争，纷扰，而对于洋大人是极其有礼的”“骄和谄相纠结的，是没落的古国人民的精神的特色”^[16]，鲁迅讽刺了中国人的骄谄相。中国人一直是善于做戏的，在《宣传与做戏》中鲁迅以多种现实例子来讽刺中国人的“善于宣传”，挖掘出中国人的虚伪。鲁迅一直关注女性解放问题，反对中国几千年来不合理的伦理纲常，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提及《申报》上报道的男子反过来控告女人是诬告一事，认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常见的，但是对于鲁迅来说，挖掘社会现象中所暴露的国民性问题胜过很多。

其次，在《二心集》中鲁迅将改造国民性与现实斗争相结合。作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宣传者，要时刻认清现实，对现实进行批判，“急速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铭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17]，在如此紧张的

创作环境中，鲁迅通过杂感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进行改造社会的战斗。暴露国民性是与当时黑暗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的，在中国国民的种种表现上可以看到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例如在恶劣的环境中国人所表现出更令人痛心的奴性，中国人只是看到国外的战争巨片，就“不意中也会觉得主人如此英武，自己只好做奴才”^[18]，面对侵略也只求安逸、从不反抗，中国人的奴性思想实质上是另类的投降。鲁迅在《二心集》中与各路敌人进行斗争，讽刺他们在特殊环境中暴露的本相，为改造国民性奔走疾呼。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代，在日本侵略的“国难声中”，中国社会的表现是“沉滓泛起”，各路人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有明星、文艺家等等，上海社会形形色色的现象在鲁迅的笔下无处遁形：“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依旧沉下去”^[19]。在革命的发展中，鲁迅善于寻找教训，直言有些革命文学者身上存有沉积的病根：“在中国，去年的革命文学者和前年很有点不同了。这固然由于境遇的改变，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20]，以此来呼吁这些学者去正视，去改造自身的病根。经历时局的发展变化，鲁迅不断地将改造国民性思想与时代环境相结合，在与当局、侵略者、社会渣滓、文人走狗等的对抗中，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鲁迅批判与讽刺的武器，可以说鲁迅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人。

最后，在《二心集》中鲁迅以对未来文明的试想完成对国民性思想的建构。除了对过去、现实中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在《二心集》中也展现了对中国未来文明的憧憬：“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

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21]，在与传统、落后的历史文化的对抗中，社会科学是促进中国人向前发展的力量。社会上存在着自以为大的艺术家，但是鲁迅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上，认为：“然而时代是在不息的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22]。鲁迅基于爱国热情，在文艺发展困难的时代中揭露历史和现实，表达出对中国文明生存前途的担忧，以这样的精神去激发国人的精神，是其在杂文书写中的重要贡献。

三、鲁迅杂文中国民性思想的表达方式

鲁迅一直致力于改造国民性，创作前期多以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国民性思想，并形成了多种表达方式。到了杂文写作时期，对于国民性思想的表达更加成熟，对比小说，在杂文这样具有战斗性的文体中，国民性思想的表达方式具有独特性。同时，杂文本身作为可以直接反映社会动向的文体，在挖掘国民性方面可以与诸多社会现实相结合，加之激烈的社会斗争和鲁迅强烈的战斗精神，使改造国民性思想多放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对发展前景的关注上，因此鲁迅杂文中国民性思想的表达方式更具内涵、更加深刻。以《二心集》为例，挖掘鲁迅杂文中国民性思想表达方式的独特性。

首先，鲁迅杂文从社会现象入手来揭露国民劣根性。鲁迅小说通过塑造国民的典型代表来挖掘国民劣根性，不论是孔乙己、阿Q、祥林嫂，还是高老夫子、四铭等人，鲁迅对他们的形象进行了全方位的塑造，通过他们与社会生活的接触、他们自我的心理斗争

来暴露他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而杂文没有小说中所虚构的典型代表,杂文文体的特殊性使其从社会上的真实人物和事件入手,讽刺社会现象,挖掘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国民性。如在《以脚报国》中以杨绛华用脚“征服”外国人的事件入手,讽刺社会上如杨绛华的一类人不正视国内的现实,粉饰太平,揭示中国人善于自欺欺人的劣根性。杂文作为能够迅速反映社会事件的文体,能够展现整个社会的风貌,因此在鲁迅的杂文中多举现实社会中的例子来挖掘国民性。例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讽刺从古至今的流氓,其中就以上海的流氓为例,分析他们的做派:假如他们看到一男一女在走路,用中国的理论则说他们因有伤风化而犯法,假如他们看到一个人在路边小便,用外国的理论则说他应该被抓到捕房去。在论证的过程中,鲁迅深入现实,以现实为依托。

其次,鲁迅通过查找国民精神衰弱的源头来表达国民性思想。查找国民精神衰弱的源头是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一环,在杂文中鲁迅直接指明国民劣根性来源于旧文明。例如在《习惯与改革》中提到保守的国民的态度取决于中国的“老例”:“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21]。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中提及做古文的立意时没有明确的倾向,如同一张白纸,联想到做人,正与旧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有关。鲁迅也借用对历史的清算来讽刺国民劣根性,例如在《宣传与做戏》中直接说明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陋习,以此来讽刺善于做戏者:“难道作者真已忘记了中国女人曾经缠脚,至今也还有正在缠脚的么?还是以为中国人都已经自己催眠,觉得全国女人都已

穿了高跟皮鞋了呢”^[22]。

最后,鲁迅杂文中为改造国民性提出了解决方案。在创作前期,鲁迅国民性思想的表达多集中在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上,但在杂文中针对国民性问题则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将改造国民性与中国未来的发展相结合,是对未来国民发展的关注。例如对于民众的保守和精神僵化所导致的拒不改革,鲁迅提出:“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23],对于改变国民身上的“老例”,鲁迅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时,鲁迅提到:“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清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24],在文化发展方向上指出挖掘病根的重要性,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思路。

对于鲁迅来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25],在杂文中鲁迅书写诸多社会现实,以这些社会现象揭露中国人沉积多年的精神痼疾,同时以杂文的方式去批判和讽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国民劣根性,对改造国民性的意识更加强烈。鲁迅在用杂文表达自己国民性思想的过程中,不忘对历史的清算,并结合社会现实对国民发展前景展开探讨,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关切和开拓新文明的热情。不论是在挖掘国民性的决心上还是在国民性表达的内容上,鲁迅的杂文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这也使得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得以传递下去,对后世文学创作

和社会文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杂文体现着其精神追求,这些精神追求为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启发,其中改造国民性的精神追求使鲁迅杂文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杂文中鲁迅书写出一个现实中国,中国国人的劣根被鲁迅无情的挖掘出来,表达的是对中国国民深切的关爱,启示中国社会改造国民性任重而道远。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具有跨时代的力量,在当今社会,鲁迅杂文中所挖掘出的国民精神痼疾仍然存在,需要以鲁迅的精神为指引,不断剖析与反思自我,不断提高国民精神,促进国家与社会文明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❷

参考文献

- [1][2]《鲁迅传》,吴中杰著,第21页,第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 [3]《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著,第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 [4][5][7]《鲁迅杂文全编.1》,鲁迅著,第51页,第95页,第1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6]《两地书》,鲁迅、景宋著,第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 [8]《鲁迅小说的中国形象研究》,吴翔宇著,第99页,北京: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
- [9][15]《鲁迅杂感选集》,鲁迅著,瞿秋白编选,第20页,第2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 [10]李振坤:《试论鲁迅后期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
- [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鲁迅全集.4》,鲁迅著,第228页,第309页,第328页,第422页,第419页,第333页,第305页,第246页,第316页,第229页,第346页,第229页,第3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25]《鲁迅全集.6》,鲁迅著,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